

# 天下理念下先秦诸子的包容思想

陈荣庆

(宜春学院 科研处,江西 宜春 336000)

**摘要:**先秦诸子的天下理念中拥有浓郁的包容思想。儒家强调道德,倡导礼让,对天下之人宽容;道家认为天下人都源自一体,天下之物应该自由生长;墨家和法家认为应该用规则来维护天下秩序的稳定,促进人们之间的宽容。这些思想构筑成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优秀传统,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。

**关键词:**先秦诸子;天下理念;包容思想;社会治理实践

**中图分类号:**B222

**文献标志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671-6248(2015)02-0021-05

只有具备包容心态的民族才能成为伟大、坚韧的民族,才能长时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而各个民族的包容既有共性,又有各自的特色,共同营造了一个斑斓的世界。

中华民族自古宅心仁厚,宽待天下,奉行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,道并行而不相悖”,宽柔以教,不报无道,宏量地与其他各民族共同生存与发展,创造了伟大、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。中华民族的这一特质,在先秦诸子思想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。

先秦诸子感于时世,怀抱清治天下的胸襟,寻找天下治理的良方,在他们天下理念的背后,有一个基本共识,那就是对天下万事万物的包容心态。

## 一、诸子各家天下理念中的包容思想

第一,儒家认为,天下应该是一个有道德的天下,人之为人的最大特征是有德。有德,就有对天下的包容。治理天下的最好方式是天子(圣人)依靠自身内在的道德感召,让他人心悦诚服地依附。天

子通过修美德、行仁政达到天下的自然和谐,反对通过战争等暴力手段来维持一个表面稳定的状况。对待自然万物,人类要取之以时,用之以度。

孔子生活时期,西周所确立的天下形态依旧保存着,周天子依旧是各个诸侯国名义上的天下共主,孔子以有道德为天下的价值共识基础。孔子认为,天下治理一定要以德、以礼让治国,才能获得天下民心,才有治理天下的道德基础。为政以德,百姓才会蜂拥而至,如草顺风、众星拱北辰般地心归君王。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

以德治理天下最基本的表现手段是爱人:“泛爱众而亲仁”,“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,爱人就是宽恕,就是包容。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(《论语·颜渊篇》),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“以直报怨,以德报德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,使得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省者怀之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,“近者悦,远者来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。

孟子生活于战国,其时诸侯国不再尊周天子之

收稿日期:2014-12-20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13BZX042)

作者简介:陈荣庆(1966-),男,江西丰城人,教授,哲学博士。

直系后裔为天下共主,但孟子仍继承孔子的天下理想,以有仁义为天下的价值共识基础,主张若要王天下,必须施行仁政:“古之得天下也以仁,其失天下也以不仁”,“尧舜之道,不以仁政,不能平治天下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。施仁政就必须尊重天下百姓,以自己之心推想天下人心: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,“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;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。由己及人,自己乐而天下乐,才能得天下民心。此即为孔子的爱人思想。

孟子特别强调治理天下要严禁战争,不能乱杀无辜。“杀人之父,人亦杀其父;杀人之兄,人亦杀其兄。然则非自杀之也,一闲耳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杀别人就是杀自己。只有“不嗜杀人者能一”天下,因为“如有不嗜杀人者,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,民归之,由水之就下,沛然谁能御之?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所以要严惩那些好战者:“善战者服上刑,连诸侯者次之,辟草莱、任土地者次之。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

孟子的包容思想特别表现在对天下的博爱情怀。孟子提出处理天下事务必须从天下全局来思考,不能如白圭治水,以邻为壑。“白圭曰:‘丹之治水也愈于禹。’孟子曰:‘子过矣。禹之治水,水之道也,是故以四海为壑。今吾子以邻国为壑。水逆行,谓之洚水。洚水者,洪水也,仁人之所恶也。吾子过矣。’”(《孟子·告子》)

荀子同样认为治理天下的最好利器是讲道德、修礼义。“兼服天下之心:高上尊贵,不以骄人;聪明圣知,不以穷人;齐给速通,不争先人;刚毅勇敢,不以伤人;不知则问,不能则学,虽能必让,然后为德。遇君则修臣下之义,遇乡则修长幼之义,遇长则修子弟之义,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,遇贱而少者,则修告导宽容之义。无不爱也,无不敬也,无与人争也,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。”(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)只有尊重他人,包容万物,天下才能明静。

儒家特别强调要尊重自然,对自然之物要取之于时,用之于度。孔子“钓而不纲,弋不射宿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;孟子认为牛山就是人为过度使用从而使之光秃秃的:“牛山之木尝美矣,以其郊于大国也,斧斤伐之,可以为美乎?……牛羊又从而牧之,是以若彼濯濯也。……旦旦而伐之,可以为美乎?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

儒家的天下治理中,治理者的德行是第一位的,

天下、大道的兴废存举于天子的德行高低,依今天流行的制度论者而言是人治,不是一个好的制度。但是,儒家认为人的问题在天下中是一切问题的核心,只有相信人、视别人如你自己一样可信才能有一个美好的社会。那种时时怀疑别人、事事监督别人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牢笼(尽管它无限的大),而决不是一个美好、轻松、愉悦的世界。总是怀疑别人,自己本身就存在一份卑劣。这样的制度,不是人类理想的家园。

第二,道家认为,天下原本的形态就是万物同一,诸事万物都平和地生活在一起,没有谁对谁的优先与高贵,故而天下的治理以“无为”为先,因天任物,包容人与万物的自由生长。一方面,道家同样认为天子在天下治理上必须要有垂范之德,不扰民而使民自治。“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。”(《老子·二章》)“我无为,而民自化;我好静,而民自正;我无事,而民自富;我无欲,而民自朴。”(《老子·五十七章》)君王做天下表率,无为于民,天下自然纯朴。“无为”就是不扰民,不去刻意生事,因顺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,天下自然太平。另一方面,道家从万物起源的角度来论证天下万物的平等,由此推出人人都应该有宽宏的包容心态。老子认为,天下万物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原点,“道生一”而“生万物”,所以天下是一个万物平等、相容共存的世界。天道无亲,也就无贵贱、无利害,人与人对等,人与其他万物共存,天下为一体,众人为一家,和谐而自然。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(《老子·二十五章》)

老子认为,道生万物,天下本来就是一个整体,所以看待天下事情必须从整个天下的视角来思考,“以身观身,以家观家,以乡观乡,以邦观邦,以天下观天下。”(《老子·五十四章》)由此,人们不应该专注于个体的小利,而是要跳出现实中的利益之争:“善者,吾善之;不善者,吾亦善之,德善”(《老子·四十九章》),以道的包容万物之情怀去善待一切。

庄子承继了老子的天下万物同一思想:“万物皆一也”(《庄子·德充符》),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,世界就是一个共存的整体,无内外之分,去夷夏之别,天下一家。

第三,墨家和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先天的不同,存在缺少包容的情况,但理想的社会应该和顺清朗,有着宽广的胸怀,故而提出用职位规定等制度来维护天下的稳定,促进人们之间的宽容,全天下人都平和地生活。

墨家与法家都承认人有自爱的天性。墨子认为:“古者民始生,未有刑政之时,盖其语人异义。是以一人则一义,二人则二义,十人则十义,其人兹众,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,以非人之义,故文相非也。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,离散不能相和合。天下之百姓,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,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,腐臭余财不以相分,隐匿良道不以相教,天下之乱,若禽兽然。”(《墨子·尚同上》)商鞅认为民始生时:“其道亲亲而爱私。亲亲则别,爱私则险,民众而以别险为务,则民乱。当此时也,民务胜而力征。务胜则争,力征则讼,讼而无正,则莫得其性也。”(《商君书·开塞》)但对人这一天性,墨家与法家都不提倡用打压的方法来迫使天下维持表面的稳定,而是希望用一种大家都认可的、积极而包容的方式来获得良性发展。

墨家认为理想的天下必须要有统一的领导、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、完善的职责分工,由此来处理人与人之间、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,达到上下一致,天下“尚同”。人人尚同,也就人人包容,天下清和。

法家认为治理天下,专任儒家的仁爱或墨家的尚贤还是不行,必须得设立制度,有一个边界将人的天性限定,使得别人也能发展,社会和谐与稳定。商鞅认为,鸿蒙初开时,人人亲亲而爱私,纷争讼多,故此贤者立中正以治,民以仁为本;然而由于“尚贤”,天下仍不安定:“凡仁者以爱利为务,而贤者以相出为道。民众而无制,久而相出为道,则有乱。”所以后世圣人明分、立禁、立官、立君而使制度一统,天下才得以治理。慎到认为,若要治理好天下,就需分工定名,界定职能,分类而治。“古者,工不兼事,士不兼官。工不兼事则事省,事省则易胜;士不兼官则职寡,职寡则易守。故士位可世,工事可常。”(《慎子·威德》)社会必须名定:“一兔走街,百人追之,贪人具存,人莫之非者,以免为未定分也;积兔满市,过而不顾,非不欲兔也,分定之后,虽鄙不争。”(《慎子·逸文》)名分有定,职能有别,制度统一,人们就会不争,就会相互包容,天下自然平安。

## 二、诸子天下理念中包容思想的社会背景与实践

总括诸子的天下思想,可以看出他们在人与人之间、社群与社群之间、人与天下万物之间都认同应该有着全面的包容。而形成诸子的这种观念,是当时社会有着这一思想的基本共识和实践。

### (一) 天下一体的社会模型

先秦时期社会思潮认同天下就是一个整体,全天下人虽有住地的不同、文明程度的高下,但都是天下一家,都是兄弟。《老子》已经从世界起源的角度阐述了天下一体的根基。在社会心理上,我们可以从《周礼》中得知,西周以来的“天下”模型是:以“中国”为中心(也即以王都为中心),呈同心圆形向四周扩散,永无边界,只要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地方,都属于天下范围,属于天子的领域。这些区域之间的差别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,高者为“中国”,低者为蛮夷之邦。天下是由文明程度构成的阶梯状的包容体系。

特别有意味的是,仅就地理方位而言,“中国”是大致的、模糊的动态概念,它不是固定的那一块区域,而是在不停的变迁中。原来是蛮夷之地,只要文明程度提高了,接受原来的“中国”文明,也就自然而然地属于新的“中国”范围,“中国”的区域也就扩大了。相应地,其四周末开化的蛮夷之地成为新的、需要进一步感化的地区<sup>[1]①</sup>。文明的进程就是“中国化”的过程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周夷王时期楚子熊渠说:“我蛮夷也”;记载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熊通伐随时还说:“我蛮夷也。”但到了公元前560年,《左传·襄公十三年》记载楚臣子囊说:“赫赫楚国,而君临之,抚有蛮夷,奄征南海,以属诸夏。”原来自称蛮夷的楚国,现在却以抚夷的诸夏自称,自居为诸夏一员,并与其他诸夏的安宁而征伐别的蛮夷了。谁都可以变得更好、更文明、更先进,前提就是社会有这个包容心理。

这样的“天下”,拥有无限的包容可能,这与生而不变的种族、阶层分割有着绝然的不同!

### (二) 天下无外、夏夷无别的社会主潮

因为天下是一个宽广的包容体系,因而就产生了“天下无外”的观念:第一,既然天下都来自于一个源点,“天下”只有这一个“天下”,再没有别的“天下”;第二,天下都属于天子所有,天子治理天下又是按照家庭模式来治理的,那么天下的任何地方都同属一家,只有远近亲疏之别,不再有家内家外之分。由此产生的逻辑推理是:尽管有夷与夏的分别,但夷与夏都是“天下”这唯一的家庭中的一个成员,

① 杨联陞先生在《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》中说道:“由于军事、文化扩张的结果,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,所有诸蕃都有变成外藩的可能。或者更通俗地说,所有生蕃都可能变成熟蕃。”

而不是家庭之外的敌对势力的存在,所以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说商部落是“自彼氐羌”,《国语·周语上》说“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,而自窜于戎狄之间”,都不讳言自己的部落原先并不居住在中原之地,而是四夷之属<sup>①</sup>,华夷之别只是亲疏之分,不是“本我”与“他者”的关系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记载孔子在判断“肃慎氏之矢”时说“昔武王克商,通道于九夷、百蛮,使各以其方贿来贡,使无忘职业”,也是将夷蛮视为天下一家之内并进行管理的。孔子自己也“欲居九夷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,并感慨若“道不行”,就“乘桴浮于海”,这“海”应该是四夷或四夷外之地。在孔子眼中,还是属于此同一天下的。

《礼记·明堂位》<sup>②</sup>记载:“昔者周公,朝诸侯于明堂之位。天子负斧依,南乡而立;三公,中阶之前,北面东上;诸侯之位,阼阶之东,西面北上;诸伯之国,西阶之西,东面北上;诸子之国,门东,北面东上;诸男之国,门西,北面东上;九夷之国,东门之外,西面北上;八蛮之国,南门之外,北面东上;六戎之国,西门之外,东面南上;五狄之国,北门之外,南面东上;九采之国,应门之外,北面东上。四塞,世告至。此周公明堂之位也。明堂也者,明诸侯之尊卑也。”这段记载明确地体现了西周“天下一家”、“天下无外”的天下理念。整个天下,只有一个实体,只是一家,别无分店;有亲疏之别,无家庭内外之分。明堂站位按照亲疏远近,以天子为中心,最近圆心处为“三公”,依次为诸侯、伯爵诸侯、子爵诸侯、男爵诸侯,九夷君长、八蛮君长、六戎君长、五狄君长,九州的州牧、四方极远的守候边塞的小国国君<sup>③</sup>。无论是东夷西戎、南蛮北狄,还是更为辽远的四塞小国,“与本土不同的只是陌生的、遥远的或疏远的,但并非对立的、不可容忍的和需要征服的”<sup>[2]</sup>,都是天下这一家庭成员。所以春秋时期夷夏不是对立的存在,四方之民并不是一个异己的存在,双方的交往也是遵循“天下”这同一个整体的礼仪来进行,不能有超越天下礼仪的地方。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表达,即“天下无外”原则排除了把世界看成分裂式的、拥有各种异端存在的思维模式和民族主义思维模式。谢和耐评论道:“中国的普天下观,从某种意义说,更具容忍性,因为它接受不同的宗教与民族。”<sup>[3]</sup>

前文我们说中国是个动态区域,夷有可能变为夏,更为准确的说法是,夷、夏的变迁是双向的。一方面,夷接受了诸夏文化后,有可能变成诸夏一员;另一方面,随着民族迁徙幅度的增大和民族融合步伐的加快,夏、夷原有区域不断交汇,夏、夷也在不断

地发生变化,不但原有夷狄会成为新夏,而且原有的夏也可能被称为新的夷狄。如杞本为夏后裔之国,但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却称“杞,夷也”,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又载“杞桓公来朝,用夷礼,故曰子”。杜预注曰:“杞,先代之后而迫于东夷,风俗杂坏,语言衣服有时而异”;再如“须句”,本为东夷一个“服事诸夏”的风姓小国,但公元前639年邾人消灭须句时,须句国之女成风对其子鲁僖公说:“蛮夷猾夏,周祸也。”(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一年》)邾国为曹姓,周武王弟振铎之后,为华夏之正宗,但在这里,原夏为新夷,原夷为新夏。夷夏互变,夷夏一家。

在殷周春秋或者更早之时,中国也出现了内外意识。但这里的内外意识与“天下无外”的原则并不矛盾。“天下无外”是将天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,在天下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“他者”,别族不是异端。西周时期出现的内外意识只是家族内部亲疏有别的远近关系。如当时的王畿制度就规定了“外服”与“内服”的亲疏关系:“内服”及王畿,为天子所辖的千里之地;“外服”为诸侯领地,以王畿为中心按五百里一圈的比例向外排开。内、外服各有“五服”之多<sup>④</sup>。

### (三) 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包容性制度规范

我们从现有材料中可以得知,西周时期的天下框架是由天子与诸侯国两个系统构成。天子为各诸侯国的王,也是各诸侯国的大家长;各诸侯国由天子分封而来,是天子的附庸和臣下,或可说是天子家庭的分支与亲戚。天子负责制定天下共同的制度,

① 《孟子·离娄下》记载孟子说:“舜生于诸冯,迁于负夏,卒于鸣条,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,卒于毕郢,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,千有余里;世之相后也,天有余岁。得志行乎中国,若合符节。先圣后圣,其揆一也。”舜与文王这些圣人们都是四夷之人,而后得志于中国,天下之人又怎么会有华夷之别呢?

② 尽管《礼记》各篇成书时间不一,有属于孔门七十子后学、成书于春秋时期的,有成书于战国的,也有如有的学者所言成书于西汉初期的作品,《礼记》中的不少记载有当时学者们的想象在内,但不可否认的是,《礼记》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社会事实与现象。

③ 诸侯、方国朝见天子的排位,诸侯是以爵位分列,方国则按方向排列。

④ 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:“五百里甸服:百里赋纳总,二百里纳铨,三百里纳秸服,四百里粟,五百里米;五百里侯服:百里采,二百里男邦,三百里诸侯;五百里绥服:三百里揆文教,二百里奋武卫;五百里要服:三百里夷,二百里蔡;五百里荒服:三百里蛮,二百里流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上》记载:“夫先王之制:邦内甸服,邦外侯服,侯,卫宾服,蛮,夷要服,戎,狄荒服。”都说明西周时期的内服外服关系只是亲疏远近的分别,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区别。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,中原之民对四夷的视角逐渐有了些变化,华夷之辨才越来越清晰,不少时候(尤其是在夷狄进入中原时期)都不把四夷视同一家人了。但有趣的是,四夷却总是把自己视同与中原为一家,这当然有方便对中原的统治、减少中原之民心理上的抵抗因素在内。如五代时期的几个民族邦国、元朝、甚至未入关前的满族统治者,都是持这一思维。

“协和万邦”,制定时历与敬授民时,制定礼乐征伐等准则与律令,选拔贤能担任各地诸侯、三公六卿、各州牧守及巡察使,推荐下一任天子的人选及考核,五年一轮的天下巡视,处理涉及多个诸侯国的大事,如诸侯之间的争执与战争、水患的治理等<sup>①</sup>。而诸侯国的内政处理,如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<sup>②</sup>、选拔任用官吏、治理国家策略、确定税收等,都属诸侯国的内务,天子是不会干涉的,各诸侯国有自己的独立权<sup>③</sup>。《吕氏春秋·长见》记载:“吕太公望封于齐,周公旦封于鲁。二君者甚相善也。相谓曰何以治国。太公望曰:‘尊贤上功。’周公旦曰:‘亲亲上恩。’太公望曰:‘鲁自此削矣。’周公旦曰:‘鲁虽削,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。’”可见,各诸侯国在其封国内是按照自己的治国理念进行治理,而不是用同一律的方法。当然,前提是不能违背天下共存的根本。

西周时期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,具有巨大的社会包容性。各个诸侯国在遵守基本社会道德礼仪与制度的前提下,可以有自己治国方式的不同,可以独立自主地做出自己的决策,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。这是一个特别智慧的治理策略。

#### (四) 先秦诸子、士大夫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其时天下的包容

先秦诸子游无宗国,常常离其故国而旅走他乡,“楚才晋用”,秦就是因为“客人”而兴盛强大的典型,不少士大夫还因为在故国受辱、于是投靠他国来消灭故国,这充分展示了天下一家情状下的社会包容。周天子为天下共主,天下一家,故而士人能放开故乡的羁牵,自由奔走于他乡。孔子说“君子怀德,小人怀土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“士而怀居,不足为士矣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,士人不能贪图安逸,而应该奔走四方去实行天下大治<sup>④</sup>。所以春秋战国时期众多士人是在天下他处而不是在故土奋发。如吴起本卫人,他先事鲁君,后又在魏文侯处建功立业;孙武为齐人,在吴王处大展身手;伍子胥是楚人,在吴国得到重用;孟子邹人,深得齐王尊宠;荀子为赵人,得名于齐楚。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记载昭王从郭槐之言,而筑宫师槐:“于是,乐毅自魏往,邹衍自齐往,剧辛自赵往,士争凑燕。”即是。

为何能够如此?一是天下有共主,天下一家,二是各诸侯国有对人才广为接纳的“古之制”。陈筱芳先生通过考察春秋时期出奔者与出奔国、受奔国的关系后认为,一般情况下,即使是政治避难者和流放者,各国对出奔者实行门户开放、广泛接纳,出奔者甚至依然能被授予官职,而且出奔国与受奔国不

会因此而影响原有的邦国关系,原因之一就在于列国相互接纳出奔者并赐予官职是“古之制”,并成为春秋诸侯国间的惯例。如郑大夫罕朔杀人后逃奔于晋,晋卿韩宣子拟赐予其官职,征询正在晋国进行外事活动的郑卿子产什么职位合适。子产答以“卿违,从大夫之位,罪人以其罪降,古之制也”(《左氏春秋·昭公七年》)。春秋时期各诸侯继承了接纳出奔者这一古制,对出奔者的任用更加宽容。

这种“古之制”,恰是先秦士人自由奔走、天下有容的强力支持。天下本就一家,都是在天子的领导下,尽管各邦国有独立的行政权,但都是天子的受封国。对士人与出奔者而言,出走只是从一地到另一地,并没有背弃宗国之感;接受国亦如今日情形,到处招揽人才,使其为自己邦国服务。

### 三、结语

先秦诸子承继商周以来华夏先民的宽容历史传统,丰富和发展出仁政德治、物自一体、天下无外、规则制序等思想,面对天下变局,提出了各自的治理主张,这些主张都浸透着浓厚的包容理念,影响并规制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和谐世界的宽广胸怀。这种包容理念与实践,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,使之能够创造出绵延五千年而不绝、我们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为止唯一的伟大文明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杨联陞. 国史探微[M]. 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.
- [2] 赵汀阳. 没有世界观的世界[M]. 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3.
- [3] 谢和耐. 中国人的智慧[M]. 何高济,译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.

(下转第32页)

① 大禹即是因治水有功于天下而王天下。另外,《春秋谷梁传·鲁僖公九年》记载齐侯盟诸侯于葵丘,五条盟约的前二条即是“毋雍泉,毋訖条”,要求各诸侯国共同处理好水利、通商等涉多个诸侯国的事务。

② 各诸侯国除向天子述职、汇报情况等朝觐外,诸侯国之间也是紧密地互相往来。《周礼·秋官·大行人》载:“凡诸侯之邦交,岁相问也,殷相聘也,世相朝也。”诸侯之间只能有一般礼仪上的问聘,但不得私相会盟,《左传·庄公二十七年》载:“诸侯非民事不举”;孔颖达在疏《礼记·曲礼下》之“淹牺曰盟”时说:“天下太平之时,则诸侯不得相与盟。唯天子巡守至于方岳之下,会毕然后乃与诸侯相盟。”

③ 《礼记·曲礼下》记载:“君子行礼,不求变俗。祭祀之礼,居丧之服,哭泣之位,皆如其国之故,谨修其法而审行之。”说明各国还有自己独特的礼俗存在。

④ 到了《礼记·曲礼下》,略有改变,不怎么赞成去国而游:“国君去其国,则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?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?士奈何去坟墓也?”